

近日,故宫公布了重大考古发现,在对慈宁宫广场长信门西北侧基建勘探坑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一处明代早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包含一条东西向明代早期墙基,及其底部的地钉、排木组成的桩承台、夯土夯砖层、建筑基槽等遗迹。

专家表示,此处大体量墙基在层位关系、施工工艺、出土文物等方面与慈宁宫花园东侧发现的明早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基本一致,是紫禁城建造之初具有宫廷分区功能的大型墙基,而且可以判定其始建年代为明早期,废弃年代为明后期。

这一发现使故宫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组兴建于明初、废弃于明后期的建筑,将人们的目光带回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当时的紫禁城和如今的故宫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变故?

如今参观故宫,步入太和门向北望去,看到太和殿时,总会有一种“不太协调”的感觉:硕大的台基上,承托着一个体量很小的殿宇(太和殿),尤其是走到台基跟前,甚至连大殿的门窗都已经看不到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中国古代较高等级的建筑,都会修建精美的台基,台基的大小视建筑的大小而定。在明朝永乐年间建造紫禁城时,台基和上面的建筑规模是匹配的,而明朝中后期重建时,殿宇的规模就小了很多。如今,如果我们从空中俯视故宫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的基座,就会发现三座殿宇相对于它们的基座来讲,都显得太小了,这与明朝中后期“巨型木材”难以寻觅以及当时的国力日衰有关。

明朝永乐年间兴建紫禁城的时候,所选用的木材有很多都采自于我国西南边陲的横断山区,其中紫禁城主殿奉天殿(即今太和殿)更是由纯楠木建造,奢华无比。建成的奉天殿

2010年是“九八大洪水”以后的又一次大洪水,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宏观的自然环境的变化里看,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长时段的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大家感觉灾害多了、严重了,不少地方也报道灾害多少年来一遇,甚至说这是有明确记载以来最严重的灾害。

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我认为,总的来讲,既不能大惊小怪,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从宏观看,中国本身受季风气候影响,而季风气候的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不像有些地方受洋流或高空气流的影响,只是相对不稳定。从历史上有气候记载以来(竺可桢先生把它推到7000年,根据文献资料至少可以推到两三千年间),可以说中国每年东部、中部等地区都是非旱即涝,只不过是程度大一点小一点的问题,就像上海的黄梅天有干黄梅、湿黄梅,是不平衡的。

在这些不平衡的发展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大的自然灾害,不过我不同意“自然灾害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说法,因为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不同、收集资讯的来源也不同。比如,大家现在讲的历史上的很多灾害都是根据方志,但是8000多种方志主要都是清朝跟民国年间



文华门前的云纹石雕

【史海钩沉】

## 主殿比清朝大一倍 故宫发现明初紫禁城

“广三十丈,深十五丈”,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其面阔为95米左右,而进深则达到47米左右。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单体建筑,面阔仅为64米,进深为37米,远不能和明初的奉天殿相比。

究其原因,与建筑的材料有关。明初的宫殿建筑都是以木结构为主,建筑之间大多又以廊庑相连接,虽然场面蔚为壮观,但这也造成了极大隐患,那就是这些建筑一旦遇到火情,就会很容易蔓延,甚至会延烧大片建筑群。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刚建成没多久的奉天殿便因雷击而起火,结果一下子将三大殿全部焚毁。也就是说这座规模硕大的奉天殿仅仅存世几个月便“夭折”了,此后几十年,明朝的皇帝不得不将日常的朝见以及各种典礼挪到奉天门外举行,甚至几位皇帝的登基大典,都不得不设在奉天门广场。

正统五年(1440年),重建三大殿,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一场大火,又将三大殿以及奉天门(今太和门)、午门以及周边建筑烧了个精光。

后来三大殿多次重建,也多次被毁,到了清朝初年,重修了三大殿,并将奉天殿(嘉靖时称皇极殿)改为太和殿,只不过,此时已经找不到粗大的楠木了,所以三大殿的规模只好缩减。

另外,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和殿两侧的红墙,便是当年康熙皇帝为了防止火势蔓延而将原有的廊庑拆除后修造的“防火墙”,毕竟砖墙能够有效阻止火势的蔓延。

明初紫禁城的东南部,是皇太子的专属“特区”,因此位于这个区域内的城门东华门,每个门扇上只有七十二颗门钉,比午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分别少了一排门钉(一排九颗)。这一区域最为主要的建筑是文华殿,这座殿宇就相当于皇太子的“奉天殿”,太子在这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当时为了区别皇太子和皇帝的地位差

别,特意将文华殿屋顶设置成了绿色琉璃瓦,而和文华殿东西相对的武英殿,是皇帝平时斋戒的场所,因此采用了黄色琉璃瓦,并且大殿周边配有象征地位的栏板。即使从今天的地图上看,武英殿的占地面积也要比文华殿大。嘉靖年间将文华殿改为皇帝御用的便殿,不再作为太子专用场所,文华殿殿顶的琉璃瓦也被更换为黄色。后来这里便作为皇帝举行经筵日讲的场所了。

说起这经筵日讲,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课堂,在这个课堂里面,皇帝是学生,他要洗耳恭听饱学之士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以及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点评,如果不认真听讲或者态度不谦恭,老师可以直接批评作为学生的皇帝。因此在这座皇帝专属的国学大讲堂里,即使是万乘之尊也要恪守尊师重教的传统。

在文华殿西北,明初紫禁城还有一处非常奇特的建筑:“省愆居”,之所以说它奇特,是因为其建筑形制是“用木为通透之基,高三尺余,下不令墙壁至地,其四围亦不与别处接连。”这样看来,它是一座独立的、用木头做基础而建起来的小宫殿,这里是皇帝在遇到极端天气之时,在此进行反思和自省的场所。古人相信极端天气的造成都是因为为政者不仁,因此祈求好天气也成了皇帝的一项本职工作。

清朝时,只有康熙皇帝公开册立过皇太子,其他的皇位继承人要么是通过秘密立储制度确立,要么是直接从皇族内部商议后确立,因此文华殿在清朝失去了作为“太子正官”的功用。不过,如今我们参观故宫里的文华殿,还是能从建筑的细节上看出其最原始的功能,如整体上院落的东西宽度比皇帝御用的武英殿窄;御路石雕没有采用武英门的龙纹,而是采用了云纹……种种现象都体现出了太子和天子之间礼仪制度的差异。

(据《北京晚报》)



## 古人也要修学分

学分,可不要以为只是现代莘莘学子的追求,古人也曾为之拼命。

《礼记·学记》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大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也就是说,每年入学一次,隔年考核一次。一年考察辨明志向,三年考察是否专心和亲近同学,五年考察是否博学和亲近师长,七年考察是否有独立见解和择友能力,这些都达到了,就是小成,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如果到九年的时候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坚强独立而不违背师训,就是大成,意味着学业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水平。

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设立太学,可谓中国古代学制的一项重要进步。太学并无明确的学习年限规定,但考试十分严格,西汉时每年考核一次,方式是“设科射策”,相当于今天的抽签问答。东汉中期改为每两年考核一次,通过者授予官职,否则留下继续学习。隋唐时期的官学开始对学生年龄和学习年限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律学招收学生的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学习年限为六年,考试分“旬考”、“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考内容为十日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将受到处罚;岁考



内容为一年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留级;毕业考及格则取得举荐资格,否则勒令退学。

宋代实行过学分制。以后各朝代大多也都实行过。当时叫做积分制,实际上就是学分制。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曾把太学分为外、内、上三舍,外舍升内舍和内舍升上舍的升舍考试成绩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再合成分:其中操行和学业都是优者为上等,一优一平者为中等,两种都是平者或一优一否者为下等。三舍考试都实行积分法。

明朝也采用宋神宗时期的办法,凡国子监的学生都实行积分法,学生积分达到及格者,即可授予相当的官职。国子监按学业程度设为六堂:正义、崇志、广义、修道、诚心、率性,编其为初、中、高三个级别。在高年级中实行学分制,若在一年内积分达到8分即为及格,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提前毕业,破格录用。

清代的国子监编制与明代相同。每月进行一次考试,凡月考列为一等者给1分,列为二等者给半分,年终积够8分者为及格。

民国时期,积分制正式更名为学分制,并趋于完善。1931年,当时的政府颁布了《学分制统一办法》,通令全国学校一律采用学年兼学分制,并规定大学生4年需修满132个学分才准予毕业。

(据《羊城晚报》)

【声音】

## 葛剑雄： 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明朝不多,宋朝、元朝加在一起不到100种,再往前就没有了。所以,再往前除非大得不得了灾害才会有记载,一般的也记不了。因此,如果仅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确实灾害是越来越多了,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拿地震来讲,据我们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地震图集》,最早的有确切年代的地震发生在周幽王时,而且早期地震的间隔时间很长,往往几百年没有一次,实际上这是因为没有史料,其间地震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就地区而言,西藏、新疆、东北的记录很少,实际上青藏高原是地震频繁的地方,发生过的大地震不会比川西等地少。只是因为那里历史上基本是无人区,没有任何记载。

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两难选择。比如云南,一批人说不能在那里建水库,认为云贵高原的地质灾害跟建水库紧密相关。我是不赞同的。

拿泥石流来说,有的地方即使一棵树不砍,甚至一个人不去,还是会有泥石流。我认为,地质灾害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也与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有关,但不能说建水库一定就会有多大的危害。像北欧一

些国家的水利发电已经占到他们总能源的70%、80%,建的水坝并不少,却没有听说有多少灾害。但是今天确实存在着建水库时不完全考虑当地民众利益的情形,像农田灌溉、农村用水;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水资源浪费,如花了很大代价从远处引来的水却被滥用,干旱地区的城市大搞水景、大铺草坪。

水电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清洁能源,可以节约许多煤、油、气,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在江河建坝蓄水也会引发一系列的不平衡,特别是在过度开发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恶化,得不偿失。我们要辩证地看,把天灾全部归结为人祸,我是不赞成的。但如果天灾完全与人祸无关,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现在最难的是把握好度。

要把握好度,需要综合解决问题,既需要国家的宏观政策,又需要顾及各地的具体情况;既需要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需要考虑当地当时的实际,把和谐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度上。今天没有人反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关键是掌握好度。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八期)